



嘉定文史资料

第五辑



第五辑

政协上海市嘉定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Yt242105

嘉定文史资料

第五辑

(内部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上海市嘉定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0年10月

封面题字 胡厥文
封面设计 郑孝同
郭正明

嘉定文史资料(五) 内部资料

编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

嘉定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印刷：上海翔文印刷厂



吕炳奎同志在工作



梁正堂先生近影

目 录

回忆毛主席关于白区工作的一次谈话·····	毛齐华 (1)
刘少奇同志在徐行·····	杨天光 (3)
毛泽东问候顾维钧·····	陆象贤 (6)
顾维钧罢免英籍总税务司安格联·····	习五一 (9)
外冈游击队的诞生·····	吕炳奎 (12)
一张行李票签的故事·····	金 亮 (19)
南翔医师联谊社和嘉定县中医师公会始末···	李遵五 (21)
回忆微音社的两件事·····	朱正非 (26)
南翔旧闻(一)·····	钱乃之 (30)
解放前的嘉定金融业·····	王云飞 (37)
嘉定报刊谭概·····	陶继明 (43)
嘉定有线广播30年·····	施心超 (49)
师范萌芽 “新学”先驱 ——县教育局创办的“单级教授练习所” ·····	石峰 惠喧 (54)
师范教育下乡运动在我县的产物 ——记江苏省立黄渡乡村师范的办学特色 ·····	张昌革 (57)
嘉定县私立企云学校校史·····	陈德元 李志明整理 (63)
黄墙世医·····	李宝兴 (66)
深切怀念父亲胡厥文·····	胡世孚 (69)

胡厥文同志生平·····	转载《光明日报》	(73)
怀念我邑妇女界先辈沈方成同志·····	周其确	(80)
父亲和书·····	谭 燮	(83)
唐纪常·····	陶继明	(91)
大郎的诗·····	陈一凡	(93)
张君秋的业师李凌枫·····	陶继明	(97)
木业巨子朱吟江·····	朱泰来	(100)
实业家童世亨传略·····	殷家纶	(104)
方剑阁·····	黄日磅	(112)
黄日驩同志生平·····	人民卫生出版社供稿	(115)
周鼎华与南翔公学·····	周大刚 陆士良 沈春鸿	(117)
张乃璇·····	俞世雄	(121)
吴钟玉老师办学事迹点滴·····	潘世精 汤联祥口述 吴元雄摘记	(124)
周次咸先生的书法和谱曲·····	徐植义	(127)
龚继章生平梗概·····	盛克颖	(130)
明末“西学东渐”中的孙元化·····	郭正明 刘楚邕	(133)
黄淳耀殉难史实·····	李 德	(141)
清官陆陇其·····	陈炳生	(144)
“潮音庵”风雨悼忠魂		
——缅怀陈化成殉国148年·····	李济舫	(149)
飘零瘴海边 忧患托诗篇		
——女诗人钱蕙纈·····	杨 奔	(153)
王文昭是嘉定人·····	陆象贤	(156)

回忆毛主席关于白区 工作的一次谈话

毛齐华

1935年，我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指导，白区工作采取了盲动冒险的错误方针。如上海有我党组织的工厂，经常搞轻率的罢工。一个工厂罢工，往往又命令组织总同盟罢工。并且硬性地、不顾主客观条件如何，把工人日常的经济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甚至提出“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保卫苏联”等政治口号。在敌人大搞白色恐怖的情况下，还搞飞行集会，公开号召发展党的组织。结果，暴露了自己，使白区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

1934年和1935年，上海党的领导机关在接连遭到破坏的情况下，我们被迫撤退，经过艰难险阻，我到达陕北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我在中失机关白区工作部工作。

1936年春，毛主席从前线回到瓦窑堡，召开中央会议。会议开始前，周恩来副主席把我介绍给毛主席，告诉他，我是从上海来的。他和我亲切地握手问好。散会后，毛主席笑着请我有空时上他那里谈谈。第二天我就去了。一进他住的屋，看到两只行军箱外，床上、桌上到处都是书。毛主席要我坐下，详细地询问了白区的情况。我就把上海党组织遭到破坏

的情况作了汇报。他听后说：在城市，敌人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轻举妄动是不行的呀！他又用商量的口气问我，从整个城市来说，敌占优势，但在一个工厂或一个车间，经过细致的群众工作后，能否建立隐蔽的力量优势呢？我说，根据过去上海工厂里工作的经验，只要发展四五个得力的党员，完全可以做到使全厂工人在我党领导和影响之下。他说，要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不能轻举妄动，要长期埋伏，等待时机呀！工人的斗争是客观存在的，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去组织、领导他们进行斗争。斗争要讲究策略，要“有理、有利、有节”，要注意积蓄力量，斗争要适可而止。后来，我们一直用这个思想指导和教育敌占区和蒋管区的地下工作者。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毛主席的一整套地下工作方针，就是用这一思想作指导的，使党的地下组织不断发展和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最后，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军胜利地解放了上海，并从国民党手中接管过来。

（原载南翔镇《文史资料》丛刊第1辑）

r

刘少奇同志在徐行

杨天光

1958年10月23日，徐行公社办社伊始，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魏文伯、嘉定县委书记牟敦高的陪同下，前来视察徐行。

下午一点，蔚蓝的天空，没一丝云彩。少奇同志乘坐的汽车徐徐地停在淞嘉公路9号桥堍。迎候在这里的公社党委书记厉彦资和第五大队党总支书记季德章赶忙上前，与走下车的少奇同志热情握手。“走，下去看看。”少奇同志不顾旅途的疲劳，一挥手，与陪同的干部一起，沿着田间小路，到了第五大队。

金秋时节，田野里一片片金稻银棉，播种不久的早地麦已长出了碧绿的麦苗，一簇簇人群，有的在深翻土地，有的在采摘棉花，有的在移栽油菜……紧张忙碌的气氛令人兴奋。少奇同志一面啧啧称赞，一面不住地向身旁的干部询问各种作物的产量和社员对“公社化”的反映。一会儿，到了第三生产队的晒场，场上晒着刚收获的大豆。少奇同志抓起了一把大豆，惊叹道：“好大的豆子啊！”当旁边的干部告诉他这是“牛踏扁”时，他风趣地说：“名不虚传。看来，这是你们这儿的特产吧。”

离开三队后，少奇同志饶有趣味地观看了大队长金启泉

和县委书记牟敦高的两块棉花试验田。试验田里棉铃累累、白花朵朵。少奇同志热情地对这两位干部说：“干部参加劳动，给社员做示范，你们带了个好头。”并亲切地问金启泉同志：“落了霜怎么办？”金启泉向他讲述了防霜的土办法后，他满意地笑了。

途中，少奇同志还视察了范桥小学。这时，学生们正在“学农田”里深翻土地。少奇同志详细询问了学校的规模、课程设置后，语重心长地对领队的孙友文老师说：“小学生是祖国的花朵、祖国的未来，一定要好好培育，使学生德育、体育、智育全面发展，为培养下一代作出贡献。”孙老师激动得不住地点着头。最后，少奇同志和师生一起照了相，才离开学校。

在五大队办公室里，少奇同志认真听取了公社党委书记厉彦资关于徐行公社办社近一个月以来的工作汇报。休息时，他信步走进了大队实验室。实验员诸邦强急忙站起来，少奇同志按住他坐下，亲切地问：“你们这里实验些什么？实验的项目有多少？”诸邦强回答说：“我们主要是实验土农药、土化肥。”少奇同志以征求的口吻说：“让我看看好吗？”诸邦强当即取出了一瓶枫杨树叶汁的土农药递给少奇同志，并讲述了它的用途和防治效果。少奇同志连连称赞：“好！好！”这时，在场的干部和社员都活跃起来。有的说，我们现在搞试验，将来搞了大工厂，还要请您再来这里看看。少奇同志说：“好啊！好啊！”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离开大队办公室，少奇同志顺路走进一户社员家里。恰巧，老年社员张阿珍在家里做家务。少奇同志一面打量着她家中的陈设，一面和张老太拉起家常。当他听到张老太有时还要到队里托儿所带小孩时，很关切地对张老太说：“年岁已

高,要多保重身体啊!”临走时,少奇同志还高兴地和张老太一起合影留念。

夕阳西下。少奇同志将近一个下午没有休息,可他毫无倦意,还在和厉彦资同志边走边聊,看到田间河流纵横,密如蛛网,很关心地问:“有没有养鱼?”当他听到公社不仅大量养鱼,而且自己也能繁殖鱼苗时,高兴地说:“你们想得真周到。”

霞光渐渐淡下去了。少奇同志到了第六生产队,正在观看季德章的小麦试验田时,在这里学农支援“三秋”的上海成都第二中学的十多名少先队员闻讯急忙列队跑步赶到少奇同志跟前,向刘主席行了队礼,一名少先队员还给少奇同志戴上了红领巾。这时,闻讯而来的人越来越多,少奇同志不断地向人们问好……

天微黑了,少奇同志才恋恋不舍地告别了社员群众,离开了徐行。

毛泽东问候顾维钧

陆象贤

1945年10月，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邓发在飞往巴黎参加世界工会大会途中，曾在伦敦逗留，专门拜访了国民政府驻英国大使顾维钧，转达毛泽东对他的问候。

毛泽东为什么要向顾维钧致意？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顾维钧向蒋介石建议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要包括中共代表在内，并且提名董必武出席。《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卷中有一节就叙述了他提名董必武为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的经过：“我在国内时，曾竭力主张代表团应该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鉴于国际舆论和国内形势，我深信使代表团包括各党各派的代表是明智的。我的观点实际上是，我们应该摒弃内政上的歧见，以一个团结统一的阵容，出席旧金山会议；须知这是世界历史上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我虽早已认识到，要一个共产党人参加到代表团里面去的想法，是重庆政府的领导人们所深恶痛绝的。因此，我最初向某些党政要人们透露我的意见时，尽量做到委婉谨慎，结果他们都不大赞同。他们的大多数，包括我的一些朋友在内，都劝我不要向委员长谈及此事，否则将自找麻烦。但我认为，扭转关于中国政治不统一、四分五裂的看法很重要，所以我想，如果径直

做下去，终会得到人们的谅解。接着，出现了一个意外的情况，罗斯福总统给委员长发来一份电报，他所极力主张的，恰好是我过去提出的建议。我认为，罗斯福的这一行动对委员长最后决定指派一名共产党人参加代表团，是个重要因素。”“当我同其他党政领袖如吴铁城、张群等谈及此事时，他们都说，没有一个共产党人具备当代表的资格。我说，董必武就可以。我任驻法大使时，在巴黎同董先生曾有一面之缘。觉得他和众人也没有多大不同。他年事稍长，但通晓国际事务，使我颇感惊异。例如，我们谈到中国的对外关系，甚至还谈过俄国人的问题，而我们彼此的观点却是距离不大的。当然，关于苏俄政府的内幕问题，我们的看法是不一致的。不过这种见解上的差异并不影响我们讨论国际关系问题。”由此可见，当时顾维钧从大局出发，有胆有识，力排众议，促进团结，是值得称道的。

另一个原因，是顾维钧支持解放区工会代表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出席1945年10月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工会代表大会。国民党起初一口拒绝，经过周恩来、朱学范再三交涉，顾维钧也打电报给外交部建议中国工会代表团须有解放区工会代表参加。在各方面的力争之下，国民党当局才发给邓发的出国护照。这也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周恩来曾对此评价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和包围，使我们得到的消息很少，世界各国人民也不够了解我们解放区的情况。因此，我们要从参加国际工人运动这个突破口冲出去，与各国人民建立联系，把我们的消息传出去，与各国人民互相支援，共同前进。

世界工会代表大会开幕以后，邓发在大会上的发言得到

世界各国工会代表的支持，他和刘宁一被选进了世界工联的领导机构。在邓发再到伦敦同顾维钧见面时，顾维钧同他一起进餐，坦率地交谈，对他说：“任何国家只有统一才能强大，只有强大，中国才能取得国际大家庭中应有的地位。”

（转载1989年12月23日《团结报》）

顾维钧罢免英籍总税务司安格联

习五一

在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中，涌现出一批具有近代民族意识的外交家。顾维钧先生是这群外交名流中的佼佼者。他在巴黎和会上，力争国权，语惊四座，从此闻名。北洋末年，他曾出任内阁总理，面临残破的政局，居然在外交上也有创举。罢免英籍总税务司安格联就是其中一例。

1927年1月31日，北京政府内阁总理顾维钧，以摄行大总统职权名义宣布，罢免英籍总税务司安格联，委派总税务司主任秘书易执士暂代其职。

这道出人意外的罢免令，是由于安格联拒绝通过海关为北京政府征收附加税所引起的。北京政府于1月中旬，决定不再等有列强参加的关税特别会议的批准，下令立即开始征收华盛顿条约附加税。在研究实施方法时，内阁官员认为，设立专职附加税征收机构，“很容易被地方各省控制”，截留税款。因此决定，通过外国人控制的海关统一征收。但是，一向专横的总税务司安格联坚持认为：“海关不能征收未经列强批准的外贸税”。他向财政总长重申其原则的必要性，表示“无论政府决定采取什么行动，海关必须独立自主”。其后，他竟离京南下。当他在汉口收到北京政府征收附加税的指令后，立即回电表示：“不能从命”。对于安格联这种倨傲固执的态度，虽然一

贯顺从洋人的税务处表示诺诺，但是以顾维钧为首的北京内阁却极为愤慨。他们认为，作为中国政府雇员，安格联“无权使自己处于可以对政府施加压力的地位上。”“似此违抗命令”，“破坏向章，岂能再予容忍！”控制北京政府的军阀张作霖，急于用附加税增补庞大的军费开支，也赞同顾维钧内阁对安格联采取强硬手段。他公开表示：“安格联为中国官吏，不服从命令，故我赞成将安免职。”于是，赫赫有名的总税务司安格联被革职了。同时，还罢免了有姑息纵容之嫌的税务处督办蔡廷干。

安格联免职令一发表，立即在中外政界、舆论界引起震动。首先，它打破了中国政府长期听凭列强操纵海关要职的恶习。《大公报》评论说：“北京政府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发表总税务司安格联的免职令”，这是“自总税务司用客卿以来未有之创举也。”中国海关设立总税务司是在1858年，当时即聘用英籍官吏。至1898——1899年，在英国公使的一再索要下，又明文规定，在英国对华贸易占第一位时，总税务司一律应聘用英国人。至此，英国攫取总税务司职权，获得法律依据，中国政府只保留了任免权。实际上，在列强的逼迫下，这种任免权也早已名存实亡。随着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国权”的呼声日益高涨，北京政府的外交名流们在对外交涉中渐趋强硬。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尖刻地评论说：“他们人人都一心想凭藉反外国人的爱国热忱纪录，来确保自己的任职。”“虽然，北京行政机构依靠我们和其它列强的承认而存在，却对我们毫无帮助。更有甚者，它越来越存心充当一名反对我们权益的恶魔吹鼓手。”马慕瑞的话显然言过其实，但它确实指出了北京政府外交名

流的一种新动向。

安格联的免职令之所以引起震动，不仅由于它打破了曲意逢迎列强的常规惯例，更主要的是，它搬倒了一位操纵金融、左右财政的洋大人。对此，《晨报》评述说：“安格联向有太上财政总长之称，既握海关全权，又负保管内外债之责，操纵金融，左右财政，历来当局，无不仰其鼻息，而安格联之允诺，可以生死内阁，安格联之言动，又可以高低公债。虽安之滥用职权，有以致此，而官僚财阀迷信外人，实为主因。举国人心之愤慨，已非一日，此次当局毅然罢免，无不痛快。”安格联炙手可热的权势并非一日形成。他任职17年来，权势随时局变化增长。民国以后，战争连接不断，军费开支浩繁，跋扈的地方军阀又常常截留税款，中央财政陷入困境，只好依赖盐税、关税为生。而关税余额的发放权在安格联手里。不仅如此，政府在金融、银行界的压力下，又将保管内债基金的权力授与安格联。这样，安格联的言行就不仅可以左右公债的涨落，甚至能影响内阁的生存。杜锡珪内阁就是因安格联不肯提供“秋节库券”的保管基金，银行界不愿承募，导致一场军警强索现金风波而垮台的。当时，北京政界流传着一句名言：“总统易换，总税务司难摇。”但是，乱世多奇闻，风雨飘摇的北京内阁这次出奇地强硬，竟用一纸公文罢免了一向稳如泰山的英籍总税务司！

（原载1988年7月9日《团结报》）